

秦汉史论丛

第六辑 ·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 编

秦

汉

江西教育

秦汉史论丛

秦汉史论丛

· 第六辑 ·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 编

95
K232.37
2
2:6

江西教育出版社



C

201551

(赣)新登字第002号

书 名: 秦汉史论丛
作 者: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
出 版 行: 江西教育出版社(南昌市老贡院8号)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昌市中心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mm 1/32
印 张: 12
字 数: 29.8万
版 次: 1994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255
定 价: 12.00元
书 号: ISBN7—5392—2296—4/G·2155

邮政编码: 330003

(赣教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秦汉史研究九十年评述·····	张传玺 (1)
秦汉气候变迁与江南经济文化的进步·····	王子今 (14)
汉代的铁币及其使用状况·····	王文涛 (32)
汉代岭南的青铜铸造业·····	张荣芳、王川 (49)
汉简与汉代西北屯戍盐政考述·····	谢桂华 (71)
汉简簿籍与经济管理述要·····	李钧明 (86)
汉代豪民私债考评·····	王彦辉 (98)
试论东汉防灾赈灾措施·····	刘太祥 (114)
论秦汉统一的地理基础·····	葛剑雄 (127)
秦代江西开发及其县置之蠡测·····	肖华忠 (146)
《秦简》所见之“非公室告”与“家罪”·····	〔韩〕金 烨 (156)
汉初法律系全部继承秦律说	
——读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札记之一·····	高 敏 (167)
浅议司隶校尉初设之谜·····	朱绍侯 (177)
汉代“将屯”考略·····	陈晓鸣 (186)
西汉循吏酷吏辨·····	薛明扬 (200)
略论两汉时期“门生故吏”制的形成·····	高 凯 (209)
《荀子》中关于“农士工商”的论说·····	〔日〕堀 毅 (220)
秦汉工商管理思想析论·····	文兆哲、刘承禄 (233)
秦汉园林特点琐议·····	徐卫民 (241)
秦文化的南播·····	黄留珠 (253)
儒法并用 移风易俗	
——秦始皇礼俗改革初探·····	李福泉 (267)

从民族文化心理论秦朝的灭亡·····	杨东晨 (280)
汉代人的始皇观·····	张文立 (294)
论董仲舒“素王”观的现代意义·····	罗义俊 (309)
韩信《汉中对》战略决策思想简议·····	徐勇、黄朴民 (320)
试论汉代的家庭家族教育·····	胡 青 (331)
东汉的经学与史学·····	张 涛 (343)
东汉墓祭问题试探·····	张鹤泉 (355)
附 录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六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纪要·····	方志远、卢星 (371)
后记·····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 (380)

秦汉史研究九十年评述

张传玺

我国史学家用近现代的观点和方法对秦汉史进行研究，大约开始于1900年左右。从那时到今天，已有90多年了。据我不完全统计，在这个漫长的岁月中，学者们已发表的有关秦汉史的论文和资料约有17089篇，已出版的有关秦汉史的专著有1598部，其中包括了台湾学者自1950年以来发表或出版的有关秦汉史的论著。如果扣除其中的“语言、文学”和“考古与文物”（“民族地区考古”仍归入“少数民族关系”中）这两个非传统性史学内容的部类，仍有论文和资料11557篇，专著1186部。应当说，成果丰硕。正是由于有了这些成果，不仅使人们弄清楚了秦汉四百年间的社会历史文化的基本情况，还为研究其前的夏、商、周三代和其以后的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等重要朝代的社会历史、名物制度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这90多年的研究是一个不平凡的过程。从观点和方法来说，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不科学到比较科学的过程；从研究范围和所获成果来说，是一个从狭小到广大、从浅薄到比较深厚的过程。为了便于评述，今将这一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简述如下：

一、1900—1949年

其时间大致是从清末戊戌变法（1898年）之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10月1日）之年年底，共50年。

这段时间的前期，也就是1928年以前，中国的专业史学研究者极少，可谓“文史不分”，当然专事秦汉史研究的学者几乎没

有。有关秦汉史的论文、专著虽时有出现，但为数不多。如明夷《中国汉后宫制篇》（《新民丛报》42卷43期，1903年）、孙师郑《汉掌故吏考》（《国粹学报》3卷13期，1907年）等论文，张鹏一《汉律类纂》（奉天格政学堂，1907年）、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永嘉园丛书本，1914年）、王国维《秦汉郡考》（上虞罗氏雪堂丛刻本，1915年）等专著，都属于凤毛麟角。

1928年以后，时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不久，中国的学术界为辩论有关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发生了“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历史问题”的论战，时长近十年。论战推动了有关各方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尤其是对关键性朝代——秦汉史的研究。许多高校设置了历史学系，或在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增设“历史专业（组）”。较大的报纸开辟与历史有关的学术副刊，重要的与史学关系密切的杂志如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食货》、《禹贡》、《史学杂志》，以及部分高等学校的学报，先后创刊。中国的史学及其研究队伍正在与语言、文学分离而逐渐独立。30年代和40年代，我国史学人士从其研究观点和方法来说，基本上可分为两支：一为用传统的或资产阶级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历史的，可称为传统史观派；一为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的，可称为唯物史观派。

在这50年中，已发表秦汉史论文和资料2207篇，平均每年发表44.1篇。已出版秦汉史专著343部，平均每年出版6.9部。如都扣除“语言、文学”和“考古与文物”两类，仍有论文和资料1344篇，平均每年发表26.9篇；仍有专著225部，平均每年出版4.5部。三四十年代的代表性论文有陶希圣《西汉的社会与政治》（《民族》1卷3—7期）、吕振羽《进入专制主义封建制的秦汉时代》（《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日）、劳干《汉代察举制度考》（《史语所集刊》17期）。专著中比较重要的有翦伯赞《中国史纲》第二卷《秦汉史》（重庆大呼出版公司1946年出版）、吕

思勉《秦汉史》(开明书店1947年出版)、李源澄《秦汉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出版)、陈恭禄《秦汉史》(《中国史》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47出版)。这段时间是秦汉史研究的拓荒时期。

二、1950—1976年

其时间是解放后的50年代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共27年。50年代至60年代初,是大陆秦汉史研究的发展时期。当时,绝大多数学者相当热切、而且比较自觉地学习并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尽管有的人学得好一些,有的人学得差一些,甚至表现在学术问题上,观点有分歧,或针锋相对,但都在进步。因之,解放前的两支队伍至此时基本上合为一支。

50年代,曾是史学研究的黄金时代。学者们在党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的指导下,掀起了一个又一个学术讨论。中国古代史上的“历史分期问题”、“土地制度问题”、“农民战争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和“汉民族形成问题”,被喻为史家论坛上的“五朵金花”,而其中的四朵金花都以秦汉史为关键。只有资本主义萌芽属于明清史上的问题。此事也说明了秦汉史的地位多么重要。

50年代后期,学术界开始受政治干扰,在学术讨论中出现了很不正常的情况,即不管事实如何,都扣帽子,打棍子,甚至进行“政治批判”。进入60年代,情况更加严重。相继而来的“文化大革命”曾一度疯狂进行的“评法批儒”,大搞“影射史学”,更是一场“政治闹剧”,不足为训。

“文革”前17年已发表的秦汉史论文和资料及“文革”中有代表性的文章和资料共有4301篇,平均每年发表159.3篇。已出版秦汉史专著336部,平均每年出版12.4部,如都扣除“语言、文学”和“考古与文物”两类,仍有论文和资料2795篇,平均每年发表103.5篇;仍有专著305部,平均每年出版11.3部。在前17年中,学者们热烈地参加学术争论,忙于赶写论文;对于撰写专

著则有所疏慢，所以这一时期论文多，专著少。而且论文的质量也在迅速提高，而专著相对地显得单薄。当然这不是说这一时期的有关专著不重要，相反地，这些专著是我国建国后的第一批用新观点新方法写出的著作，都有适应教学和研究需要及发展新史学之功。代表性论文有范文澜《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历史研究》第3期，1954年6月）、翦伯赞《关于两汉的官私奴婢问题》（《历史研究》第4期，1954年8月）、束世澂《秦汉社会矛盾与阶级结构的分析》（《华东师大学报》第1期，1960年3月）。代表性专著有何兹全《秦汉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出版）、贺昌群《论两汉土地占有形态的发展》（同上1956年出版）、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群联出版社1955年出版）、漆侠《秦汉农民战争史》（三联书店1962年出版）。

故说这段时间是秦汉史研究的发展时期是可以的。

三、1977—1992年

其时间是从“文革”结束到现在，共16年。人们对这段时间中的“史学”面临的状况评价不一。许多人说是“不景气”。我认为此说很不全面。全面的说法应是“史学”在不很景气的情况下获得丰收的时期。秦汉史也是如此。

在这段时间中，共发表论文、资料10581篇，平均每年发表661.3篇，为“文革”前年平均的4.2倍，为解放前年平均的15倍。共出版专著919部，平均每年出版57.4部，为“文革”前年平均的4.6倍，为解放前年平均的8.3倍。如都扣除“语言、文学”和“考古与文物”两类，仍有论文、资料7418篇，平均每年发表的463.6篇，为“文革”前年平均的4.4倍，为解放前年平均的17.2倍；仍有专著656部，平均每年出版41部，为“文革”前年平均的3.6倍，为解放前年平均的9倍。我们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在1981年即已成

立，中国的大多数秦汉史研究者是我会会员。因之，在这累累的硕果中，我会会员的成果占有首要地位。如林甘泉主编《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朱绍侯《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上、下册（齐鲁书社1984年出版）、柳春藩《秦汉封国食邑赐爵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黄今言《秦汉赋役制度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出版）、高敏《秦汉史论文集》（中州书画社1982年出版）、张传玺《秦汉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林剑鸣《秦汉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此外，张荣芳、熊铁基、黄今言、刘光华、黄留珠、王云度、刘泽华、王连升、刘修明、孟祥才、罗庆康、葛剑雄等，对秦汉的社会经济、财政赋税、军事、思想、农业、屯田、农民战争、民族关系、区域开发、文化生活、人口问题、人物评价等都有重要论著。高敏、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林梅村、何双全、周天游等，对秦汉简牍、文献的整理、研究，亦都有重要成就。老一代学者在这一时期也出版了众多著作。如张维华《汉史论集》（齐鲁书社1981年出版）、马非百《秦集史》（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傅筑夫、王毓瑚《中国经济史料》（秦汉三国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韩连琪《先秦两汉史论丛》（齐鲁书社1986年出版）、陈直《居延汉简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等。民族史专家林干《匈奴通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木芹《两汉民族关系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出版），考古学家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等都很重要。

若干年来，台湾秦汉史学者写出了许多重要论文和专著，我幸得台湾台中市东海大学吴福助教授的支援，才对这一情况略有了解。论文与专著在我主编的《战国秦汉史论文索引》及《论著索

引续编》两书①中都有著录。论文且不谈，专著中有代表性的如劳干《秦汉史》（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5年出版）、钱穆《秦汉史》（香港九龙1966年出版）、姚秀彦《秦汉史》（台北市三民书局1975年出版）、瞿兑之《秦汉史纂》（鼎文书局1979年出版）、邹纪万《秦汉史》（长桥出版社1979年出版）、韩复智《汉史论集》（文史哲出版社1980年出版）、吴福助《史记解題》（国家出版社1979年出版）、劳干《居延汉简》（考释之部）（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60年出版）、陈槃《汉晋遗简识小七种》（同上1975年出版）。此外施之勉教授对秦汉文献的研究，马先醒、邢义田教授对秦汉史及简牍学的研究，都有巨大贡献。

就我国大陆的秦汉史研究者来说，所以取得这样巨大的成绩，与以下四个条件分不开：

1. 研究队伍强大——我们的研究队伍由老中青三代人组成。老的是指元生代学者，今天已七八十岁了，不少人健在，而且仍对专业研究锲而不舍，勤耕不辍。今之五六十岁的学者属于中生代，由于在“文革”中失去的韶光太多，心情急切，都在兼程并进，著书立说。今之三四十岁的学者属于新生代，欣逢太平盛世，风华正茂，敢想敢干，大有作为。这三代学者会战于秦汉，犹如银河经天，光彩夺目。我会至本次会议，已举行年会六次了，每次年会都有众多的会员要求与会，只是由于名额所限，仅有百人左右参加，可是所交论文常常有七八十篇之多。此一事例也说明了秦汉史研究队伍的兴盛状况。

2. 研究领域广阔——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传统课题是政治制度、农民战争、土地制度、历史事件、人物评价等。秦汉史的研究也是如此。可是今天，情况大有改变，研究领域已扩展至经济史、社会史、民族史、文化史、宗教史、地区史、军事史、历史地理等各个方面。对考古发现的追踪研究，尤为可喜。就是对传

统课题的研究也比过去大大深入了。队伍大，课题多，再加上主观努力，成果累累是必然的。

3. 专业性杂志大增——“文革”以后出现的与历史关系密切的杂志很多，如雨后春笋。高等学校大发展，几乎校校有学报。各省（市）都有社会科学院，院院有“社会科学”杂志。各地博物馆、图书馆、文物研究所、历史或民族研究所，都有刊物。此外，许多大报或有“史学”副刊，或定期发表史学文章。至于各种形式的史学“论丛”尚不在内。总之，秦汉史研究者可利用的园地很多，硕果得从这些园地中结出。

4. 出版社林立——“文革”以前，每省（市）只有一家大型出版社，名号冠以“人民”二字，业务很窄，一般不出或很少出学术著作。全国能出学术著作的出版社只有数家。今天，省（市）级出版社都大扩其业务，而且一省（市）有数家大出版社，即在“人民”出版社之外，都另有以出“古籍”和“文科学术著作”为主的出版社，如吉林的“文史”、陕西的“三秦”、山东的“齐鲁”、河南的“中州”、四川的“巴蜀”等等。各省（市）都有教育出版社，以其财力较雄厚，亦大出学术著作，有后来居上之势。此外，中央各部委、省市级政府的厅局、绝大多数高等学校、其他大的事业单位等亦办出版社。已见出有历史著作的出版社有数百家之多。

以上这四个条件就是使今天的秦汉史研究获得丰收的主要原因。

四、对今后研究的意见

“史学的境况不景气”问题是存在的。在这时代变革的浪潮中，有些人、有些学科、有些单位总会受到冲击。历史学科是基础学科，非应用性学科，因之，受到一时的冷落，可以理解。不过据我所知，江泽民同志前年讲：我国的青少年要学习中国近现代史，了解中国国情；今年又讲：我国的干部要学习中国历史，尤

其是中国近现代史。从今年开始，我国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相应地对学制和课程设置有所调整。调整后的新课程规定，初级中学历史课由原来的5课时增为7课时，高一已增设中国近现代史课，高二增设中国古代史选修课，对准备报考大学文科的学生实是必修课。今年我国开始实行“公务员制度”，但是，在全国原有的地市级至乡镇级干部中有近300万人只有中学文化水平。中央有关部门决定，在今后若干年内将有计划地通过全国的广播电视大学逐步把这批干部培养提高到大专水平，中国古代史是其主课之一。国际上正在兴起的中国文化热，亚洲中长期与中国有密切文化联系、尤其是至今仍使用汉字的国家，都在日益加强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这些情况也将对我们的秦汉史的研究有所推动。由此看来，在我们的困难面前，已显出光明，“不景气”的境况迟早是要改变的。我们应当树立信心，坚守岗位，埋头苦干，奋发图强。

对今后的研究，同志们都胸有成竹，无须我多说。我只从总体上谈一下个人的想法。

1. 应当重新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我们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有三个组成部分，无须我说了。我要说的是与研究历史直接有关的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的著作及其主要观点，在近现代东西方的学术界中，是公认为权威的。其中的许多总结性意见带有真理性，对我们的研究有指导意义。其他的一些研究或论述，亦有重要参考价值。当然我们绝不能教条主义地学习。但这不是说从此就不学了，不能因噎废食。我们应当重新学习，努力学习，实事求是地学习。在理论探讨上要虚怀若谷，与人为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没有学习的必要了。他们盲目崇拜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一些研究方法。如有的人热衷于主要用于研究自然科学的所谓“老三论”、“新三论”，用控制

论、信息论和系统论研究中国历史。如果从控制论角度来看，“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是因为这个社会的“结构有着巨大的稳定性”。又说“控制论把这种系统称为超稳定系统”。此论虽新，只是天方夜谭，于研究历史毫无补益。还有些人认为，研究历史不要有理论框框，不要预设框架。要如解放前的旧史学，或搞考据，或发表己见。据我所知，言者多对旧史学不甚了解，尤其是对当年那批老学者之矻矻穷年、求真求实的精神，也无兴趣。他们幻想少花力气，多出成果，其通常做法是就有限的知识，大搞排列组合，走捷径，有些成果只是他人的牙慧。古人研究历史都有立场、观点和方法，即有其理论。今天我们研究历史，更应自觉地用理论做指导。我们通过长期的实践证明，正确的理论只有历史唯物主义，其他理论都是不正确的。研究历史不学习历史唯物主义，不用历史唯物主义做指导，靠自己自发地升华理论，总结规律，那是很困难的。如果不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不熟知、不接受已有的科学研究成果，靠自己孤军奋战，那将如无舵之舟航行于大海，很难到达彼岸。

2. 全面地准确地掌握资料——秦汉史的文献资料不多，应当熟读。同时，秦汉史研究者还必须向考古进军，不然没有出路。秦简、汉简要研究，碑刻、封泥要研究，遗址、墓葬及所出器物也要研究。有的人不肯多读书，不肯在收集资料上下功夫，而主张少看书，多思考。这是一种片面主张。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既要“学”，也要“思”，缺一不可。而学习是首要的。不学习，只说空话，不会有真正的成就。范文澜先生有一幅著名的对联：“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对做学问的人来说，很有指导意义。秦汉史资料不是很多，学者们对任何一个问题的研究，都应在目前已有的条件下穷尽资料，再进行深入分析研究。不要在资料上捉襟见肘，论据卑薄，不堪一击。

3.要研究规律，凡事要问个为什么——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变化、消亡，都有其规律。社会、历史问题也是如此。仅仅研究问题的表象，不深入了解其本质是不行的。要知其然，还必须知其所以然。不论研究政治、经济、各种制度和文化、民族、事件等等，都是如此，都要深入底层，寻找其规律，最后再横向研究，上接下纳，揭示总的规律，以提高研究质量。

4. 开拓新领域，研究新问题——历史研究者对于传统研究的重要领域仍要研究，但不断开拓新领域，研究新问题是十分必要的。对青年学者，尤应如此。青年人富于进取，思想解放，精力旺盛，观察锐敏。在人类生活史上，青年时期属于开拓、创业时期。因此切勿囿于旧框框，要勇往直前，要把文献与考古资料结合，以秦汉史为主体打破两头，冲向边缘，研究前人所未研究，如：战国秦汉南北朝的经济诸问题，社会的阶级、阶层、宗教、家庭、生活诸问题，各个时期的边疆、民族、民族关系诸问题，地区诸问题，宗教诸问题，文化习俗诸问题等等。秦汉时期，疆域广大，民族众多，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切不可偏概全、挂一漏万。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为政》），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实事求是。

“史学研究的境况不景气”只是暂时的，不久即将过去，迎接我们的，将是另一个史学研究的黄金时代。

附1 秦汉史论文统计表

类 别		1900—1949	1950—1976	1977—1992	总计
1	秦汉史概况	64	184	505	755
2	政治和法律	180	148	903	1231

(续表)

类 别		1900—1949	1950—1976	1977—1992	总计
3	经济和财政	167	186	737	1090
4	社会	87	130	352	569
5	阶级斗争和农民战争	9	115	210	334
6	少数民族和民族关系②	96	242	1151	1489
7	中外关系	41	48	110	199
8	地理	115	77	498	690
9	军事	25	63	223	311
10	经学	56	85	145	286
11	诸子	65	385	257	707
12	语言、文学	273	424	1117	1814
13	文化	54	69	307	430
14	科学技术	71	190	84	345
15	宗教	20	25	100	145
16	传记	52	341	684	1077
17	历史文献	242	507	1150	1899
18	考古与文物	590	1082	2046	3718
总计		2207	4301	10581	17089
年平均		44.1	159.3	661.3	
除12“语言、文学”、18“考古与文物”外总计		1344	2795	7418	11557
年平均		26.9	103.5	463.6	

附2 秦汉史专著统计表

类 别		1900—1949	1950—1976	1977—1992	总计
1	秦汉史概况	11	9	75	95
2	政治和法律	9	7	13	29
3	经济和财政	5	14	30	49
4	社会	1	7	13	21
5	阶级斗争和农民战争		21	9	30
6	少数民族和民族关系③	28	25	46	99
7	中外关系	23	56	41	120
8	地理	9	6	24	39
9	军事	1	1	13	15
10	经学	2	5	8	15
11	诸子	21	23	77	121
12	语言、文学	17	8	98	123
13	文化	12	14	14	40
14	科学技术	2	9	76	87
15	宗教	5	4	9	18
16	传记	38	83	72	193
17	历史文献	58	21	136	215
18	考古与文物	101	23	165	289
总 计		343	336	919	1598
年平均		6.9	12.4	57.4	